



“酒中凤凰”红西凤的前世今生

出身于河东裴氏西眷房的隋代将领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言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是我国史书中最早、最系统的对丝绸之路的记载。

裴矩写到“总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说明当时的敦煌在中西交通贸易上所处的枢纽地位。自汉朝开通了丝绸之路以来，近两千年时间里，丝绸之路成了中国与西方各国交流的通道。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考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路沿渭谷道和长安—雍城—陇州道，及支线便道凤翔—平凉道、凤翔—灵台道，均经过凤翔。

所以，从长安向西而行，丝绸之路上有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敦煌和凤翔。

史料还有记载：当年，裴矩把《西域图记》呈献给隋炀帝，引起了隋炀帝的极大兴趣。经过精心的准备后，“帝（隋炀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帝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批军队、文武百官、宫廷后妃、僧尼道士及乐舞百戏计几十万人从京都出发，沿渭水西行，过扶风，越陇山，到天水郡……一路西行到达张掖，并在途中征伐吐谷浑，开办“万国博览会”。

而隋炀帝西巡所经扶风，正是如今的陕西凤翔县。文章开头就提到，凤翔同样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凤翔古称雍州，相传西周时，“凤凰集于岐山，飞鸣过雍”，唐代时遂以此改名为凤翔。敦煌有风靡世界的莫高窟文化艺术，凤翔自古有佳酿，凤翔佳酿尤以西凤酒著称。相传西凤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酒之一，号称“酒中凤凰”。

其中的“红西凤”以其绵甜顺口，更是西凤酒中的极品。

时隔几十年，同样出身于“河东裴氏”，房支西眷房的吏部侍郎裴行俭，奉唐高宗之命沿丝绸之路送波斯王子回国。途经凤翔柳林镇时，正值阳春三月，看见路旁的蜂蝶纷纷坠地，惊奇之下，让人查访，才得知是新开的一坛窖藏陈酒的香味所致，裴行俭因此即兴吟诗道：“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裴行俭回朝后将柳林酒献给唐高宗，柳林酒从此被列为御酒，誉满天下。

柳林酒就是西凤酒的前身，对发展凤翔酒业贡献最大者，当属苏轼。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仅26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从此踏上仕途。针对凤翔酒业存在的问题，苏轼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凤翔酒业的措施。他将具体方案“具录于府”，还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提出：“凤翔、京兆郡者，陕西之囊橐也”，“失之酒课，而偿之以税昔缗”。帝准奏，改变了在凤翔业上官府尽收“遗利”的作法，将一部分利益还让民间，得到百姓的拥护，酒业生产迅速发展，制酒技术也随之得到提高。特别是制曲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丝绸之路随着历史从大盛到沉寂，再到如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起航，敦煌和凤翔都见证了它的历史和一次次传奇的故事。敦煌文化艺术历经千年不衰，是全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凤翔柳林酒传承三千载，成就中外美名扬的存世佳酿。

新丝绸之路上，西有敦煌文化，代表着欧亚文明互动、多民族文化融合，成为了今天学者、艺术家、旅游者瞩目的对象；东有西凤酒，沿袭千年工匠精神，闪耀着神州凤香的荣光。敦煌有点远，我们没有办法亲身去敦煌穿越千年，一睹敦煌艺术的风采。

那么，怎么办呢？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转变，各地博物馆和机构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陆续恢复开放。春节前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大盛敦煌艺术大展”，也终于在近日重开。既如此，倒不如先从展览看起，近距离感受敦煌大美术，将千年精彩文化尽收眼底。

（企宣）

立足“六稳”“六保” 酒业迎来新机遇

■ 杨孟涵

在疫后复工的特殊时刻，今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备受瞩目。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无不牵动着各行各业的目光。

认真研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到，有不少内容惠及酒类企业，比如减税降费、推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多措并举扩消费等等，为酿酒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减税降费与稳定消费同步推进

全国两会上有关降低税费与稳消费的信息，给酿酒行业带来积极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减税降费”，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这无疑会带来正面冲击。在业界看来，生产端的“减税降费”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竞争活力，这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疫后复兴还是长远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

实际上，两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和相关建言也都涉及于此。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联主席何晓勇建议，将国产葡萄酒由工业产品列入农产品范畴，取消10%的消费税，结合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实际，逐步降低葡萄酒增值税税率，降低国产葡萄酒税负成本。除此之外，还应实施减税降费等差异化政策，将西部酿酒葡萄基地建设列入专项给予扶持，进一步支持葡萄酒产业品种选育、栽培技术、酿造工艺、生产装备、衍生品开发等基础性应用研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葡萄酒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洪江也呼吁，减免葡萄酒产品消费税，大力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这将有助于种植业、机械、包装等多个相关产业并行发展。

周洪江表示，去年张裕在国家降费减税的基础上，税负达到22%，和欧洲以及国际上产葡萄酒的国家最高税负相比，也是较高的。而在世界上主要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作为农产品，享受着多种农业补贴及优惠的税收。与之对比，国内葡萄酒生产企业仅酿葡萄酒的成本已接近或高于进口葡萄酒原酒的价格。

不止是葡萄酒生产企业，预计降税费的相关措施也会惠及白酒生产企业，这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也有利于拉动消费。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



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

业界认为，降低税费与推动消费回升，对酒业来讲是两大利好，前者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而后者则事关企业的发展动力。

农业与扶贫守护酒业基础

除生产端和消费端均有关注之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农村扶贫也有着相当的篇幅，而这也与酒业息息相关。

实际上，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酒业植根于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实施扶贫帮困，也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了酒业的原料基础，为其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脱贫攻坚”的内容中提及，“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新建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

白酒、葡萄酒产业链都涉及农业种植业，与扶贫相关。

就葡萄酒而言，我国葡萄酒生产涉及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该产业对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稳边固边，以及满足和扩大居民消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洪江以烟台朱桥鎮为例，来说明企业扶贫的带动作用。

张裕在当地建有8000亩的种植基地，周边的6个村，其中有4个村最初都比较贫穷，村里没有公共收入。张裕种植葡萄的土地从农民手上流转以后进行租用，同时企业雇佣当地的农民来打工。农民一方面有租赁土地

获取的收入，另一方面还有打工赚取的日常收入。现在，仅仅通过种葡萄这一个环节，这4个贫困村都已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卫东也同样强调了白酒产业对于扶贫的作用。对于结对扶持对象，茅台始终用心谋划助力道真县脱贫摘帽。4年多来，茅台派出了60个基层党组织、4500余人，深入48个贫困村，累计投入近3亿元。在基础设施、食用菌种植、高粱基地建设、危旧房改造、人员技能培训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道真县于去年实现了摘帽清零。

今年茅台方面计划再调整1万亩高粱种植基地，以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巩固道真脱贫成果，坚决防止出现返贫情况。

茅台还分别在仁怀、习水、播州、务川、金沙等地，建设了高粱种植基地，促进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动12万农户增收。

可以看出，酒企扩大生产基地、种植基地，对当地扶贫会起到直接作用，而国家今年倡导的脱贫攻坚，也同样有利于这些企业稳固生产根基，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产业升级与扬帆出海

产业升级、创新，也同样是今年两会中的关注重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将深化新一轮全面改革创新试验，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5G应用。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表示，自2019年以来，大型酒企陆续发布酿酒基地智能化改造的计划，酒类企业的工业信息化改造将在2020年迎来一次“互联网+”的

风潮。2020年是5G商用起飞的元年，酒类以智能化为主题的产业升级，需要深入了解5G商用的特点和技术边界，把构想落到实处。

他认为，新基建将助力5G商用的快速推广，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酒类商品的消费场景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新基建与传统的基建模式不同，商用的价值比较大，投资回报比较快，因此商业资本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酒业专家田卓鹏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步伐，在国家大力推动5G、新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酒业也将加快构建全域新零售，工业互联网、IoT(物联网)等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拓展“一带一路”，实现酒业的国际化，同样是政府以及两会代表委员的共同心声。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白酒评委委员、洋河股份技术中心副主任李薇今年的两会议案，聚焦老龄化社会及白酒产区建设，提出《关于强化中国白酒产区建设，打造飘香世界的中国名片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舍得酒业生产基地副总经理余东则建议，找准方向，用国际化思维找准切入点和办法，更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鼓励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在疫后复兴的关口，是酒业通过国际化提升产业地位的重要机遇，白酒面向洋酒的国际化竞争格局基本已定，葡萄酒同样有着走出国门的动力和压力。

澳洲大麦加税 国产啤酒涨价在即？

作为中国啤酒大麦最为重要的来源国，澳大利亚一直在中国啤酒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此番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推出，无疑大大提高了澳洲啤酒大麦的进口成本。

5月18日，商务部发布2020年第14号和第15号公告，宣布裁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存在倾销和补贴，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性损害。基于此，决定自2020年5月19日起对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反倾销税率为73.6%，反补贴税率为6.9%，征收期限为5年。

那么这一纸政令，对中国啤酒业究竟影响几何，会直接推高国产啤酒的价格吗？

对澳洲大麦依赖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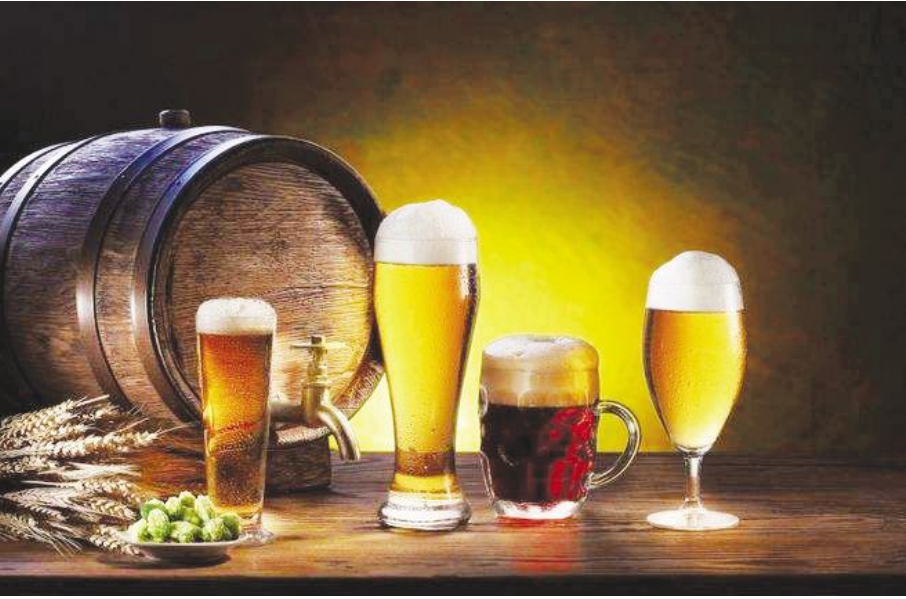
商务部的裁定让此前一直进行的反倾销调查尘埃落定，对其加征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更是引发业界巨大的反响。做出这一调查结论与决定，与自2018年就开始的、针对澳洲进口大麦的双反调查有关。当年10月9日，中国国际商会就向商务部提交了澳大利亚大麦反倾销调查申请。

这项调查申请的背景是，澳洲进口大麦在我国整体进口额中占比最大，而澳洲对于出口至中国的大麦有着“量增价跌”的现象，严重冲击到了我国本土的大麦种植产业。据统计，我国从澳洲进口的大麦数量由2014年的387.71万吨增至2017年的648.04万吨，大幅增长67.14%；进口价格则由2014年的每吨288.72美元下降至2017年的每吨198.05美元，降幅超过31%。

这样产生的后果是，中国啤酒产业对澳洲大麦的依赖度日益提高，而国内大麦种植业则日益萎缩。据统计，2017年中国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减少了约14%。

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啤酒大麦约为417.8万吨，约占我国啤酒行业使用啤酒大麦的59%。这就意味着，国内啤酒约60%的原料来源于澳大利亚。正是基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国商务部裁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存在倾销和补贴，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和补贴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决定自2020年5月19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公告》同时披露了澳大利亚主要进口商名单，包括伊鲁卡信托(The Iluka Trust)、卡尔根诺米尼斯有



限公司(Kalgan Nominees Pty. Ltd.)、JW & JI 麦克唐纳家族合伙(JW & JI McDonald & Sons)、麦秆田公司(Haycroft Enterprises)等企业。

《公告》中对于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进行了具体规定：自2020年5月19日起5年内，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澳大利亚的大麦时，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缴纳相应的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反倾销税额=海关完税价格×反倾销税税率。进口环节增值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加上关税和反倾销税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征。对最终反倾销措施实施之日前进口的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不追溯征收反倾销税。

涨价在即 尚有缓冲

对澳洲大麦加征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成定局，那么国内啤酒行业会不会就此涨价？

酒业营销专家方刚认为，大麦采购成本在啤酒生产成本中的平均占比为10%左右，意味着每吨大麦价格上涨1%，每千升啤酒生产成本将会提高约2.9元。

与此同时，方刚也坦承，这个计算方法尚待商榷，因为还有其他因素。

若按照这样一个方式来计算的话，每千升成本提高2.9元，则分摊到每一瓶啤酒中，其零售单价上升不会太多。

不过，这只是预估，能否真正影响到今年的啤酒成品价格，还有其他因素——啤酒的生产周期。实际上，按照业内的预估，很多啤酒企业的原料订单早在一季度已经完成，而相关的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的征收，要从5月份才正式开始，这中间有一个缓冲期。

有专家认为，即便原料成本提升，对于成品的价格影响也会有一定的滞后性，现在大部分啤酒企业第二季度的原料应该没问题，就是第三季度的原料成本会增加一点，但总成本涨不了很多。

酒业专家方刚也认为，原料提升对生产端的影响不会在今年内显现出来。

珠江啤酒在应对外界的询问时，给予了这样的回复——公司二季度的麦芽采购价已经确定了，三季度、四季度有框架性的锁定。从长期来看，全球的大麦供应是非常充足的。在供应非常充足的情况下，以前中国主要用澳大利亚麦芽，可能要改成用加拿大的或是法国的麦芽，是供求结构的重新组合，中国采购大麦的成本应该会上涨，但是比例不是特别大。同时，今年包材等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整体成本压力不大。

实际上，有观点认为，自从商务部2018年开启反倾销调查以来，很多酒类厂商已做好相应准备，并在这之前增加了大麦订单。也有业界人士认为，影响终端销售价格的因素很多，譬如在疫情尚未彻底褪去的情况下，预计今夏的啤酒需求量会相应减少，在这样的

情况下，生产企业对原料的需求不会增多(2020年1~4月，全国规模以上啤酒企业总产量下降22.58%)，原有的订单或已满足需求，因此澳洲大麦进口价格提升对啤酒业的价格影响会滞后显现。

原料来源多元化不涨的理由

原料来源的多元化，也让“非看涨派”多了理据支撑。

业内认为，早在2018年对澳洲大麦展开双反调查之时，国内啤酒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原料来源多元化的问题，从2018年开始，我国大麦进口多元化加强。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当年进口量从2017年的73.1%下降至10个百分点，而同期其他主要进口国如加拿大、法国等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到了2019年，由于干旱等原因，澳对华大麦出口额下降至6亿澳元(27.66亿人民币)。

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大麦进口市场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自1996年开始，从上述3个国家的大麦进口量占中国大麦进口总量的比重高于95%，其中澳大利亚是我国最大的大麦进口来源国，进口比重大多数年份都高于50%，且2011年起一直高于70%。相关统计显示，世界上主要大麦产出国除了澳大利亚外，还有多个国家。2019年数据显示，欧盟和俄罗斯产量最高，分别占据全球大麦产量的40.7%和13.06%。巴西、阿根廷、乌克兰是重要的大麦生产国加出口国。此外，乌克兰、阿尔及利亚、加拿大均是重要的大麦出口国家。

海关总署今年5月14日发布2020年第65号公告称，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关于美国大麦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美国大麦进口。这意味着，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国，美国有望成为我国大麦的供给地之一。

除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以外，提高国产原料的占比也成为支撑国内啤酒业的重要决策。目前我国大麦年产量约为150万吨，实际进入啤酒制麦环节的仅约50万吨，与进口规模相比，有较大增长空间。业内专家认为，在双反调查裁定后，相信国家对国内大麦种植业会有相关鼓励与扶持政策，以适应国内啤酒业高速发展的需求。(据中国酒业新闻网)